

招商局

近代中国研究

ZHAOSHANGJU YU JINDAI ZHONGGUO YANJIU

招商局史研究会 编
易惠莉 胡政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招商局

近代中国研究

ZHAOSHANGJU YU JINDAI ZHONGGUO YANJIU

招商局史研究会 编
易惠莉 胡政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招商局与近代中国研究/易惠莉,胡政主编;招商局
史研究会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11
ISBN 7-5004-5238-1

I. 招… II. ①易…②胡…③招… III. 轮船招商局—历史—
中国—文集 IV. F55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5337 号

责任编辑 张小颐
责任校对 修广平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木 子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1201 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21.875 插 页 2

字 数 553 千字

定 价 41.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以求真务实的学风作好招商局史研究

——秦晓在招商局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

讲话(代序) 秦 晓(1)

《招商局与近代中国研究》论文集编选说明

——兼评招商局史的研究 易惠莉(6)

招商局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秦 晓(26)

“官督商办”制度与轮船招商局的

经营(1872—1903) 陈振汉(38)

从轮船招商局看洋务派经济活动的历史作用 汪 熙(120)

中国近代航运业的酝酿和轮船招商局的产生 张国辉(167)

从轮船招商局早期历史看官督商办的两个

形态 刘广京(226)

轮船招商局经营管理问题,1872—1901 黎志刚(259)

轮船招商局国有问题,1878—1881 黎志刚(322)

20 世纪初的轮船招商局

——体制变动与军阀战争的干扰影响 朱荫贵(361)

1927—1937 年的中国轮船航运业与招商局 朱荫贵(382)

李鸿章和轮船招商局 胡 滨 李时岳(408)

李鸿章与近代企业:轮船招商局,1872—1885 黎志刚(434)

盛宣怀与轮船招商局 夏东元(472)

唐廷枢与轮船招商局 陈 锋(503)

郑观应与轮船招商局 易惠莉(540)

轮船招商局创设过程考 徐元基(577)

论清季轮船招商局的资金外流 朱荫贵(591)

19 世纪 80 年代上海金利源码头业权的纠纷 黎志刚(618)

从齐价合同看轮船招商局与外国资本的关系 陈 潮(625)

轮船招商局与日本邮船会社海技自立的比较研究

——论国家政权在中日近代化过程中的

作用 朱荫贵(651)

19 世纪中国外洋航运初探

——兼评招商局对中国远洋航运事业的

贡献 张后铨(680)

代序

以求真务实的学风作好 招商局史研究

——秦晓在招商局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前不久招商局历史博物馆刚揭牌，今天又迎来了招商局史研究会的成立。这为我们充分、有效利用社会资源开展招商局史的研究工作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和开放的系统。

一 倡导招商局史研究， 擦亮百年企业品牌

作为一家企业，招商局的历史和民族、世界是息息相关的，它既属于招商局，也属于整个社会。把这些历史遗产挖掘出来，以史为鉴，可以得到有益的收获。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在我们走向第三次辉煌的时候，局史研究也有助于凝聚员工。招商局有这么悠久的历史，是一个响亮的品牌。大家都有一种自豪感，需要把这个牌子擦得更亮。不仅要让人知道招商局是一家有 130 多年历史的老企业，也要让人看到今天这个企业发展的希望。局史研究的另一个任务是要让招商局 130 余年的历史内涵更加充分地表现出来，以便弘扬。光是历史悠久而没有什么内涵是不够的。我认为，招商局历史的内涵一个是爱国，一个是创新，当然还有

其他的可以挖掘。作为一家在特定历史环境下诞生的民族企业，招商局与生俱来就承载着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并在这种使命的推动下创造了第一次辉煌。招商局第二次辉煌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历史又走到了决定中华民族前途的重要关口，招商局同样是带着强烈的振兴中华的使命在当时推动了许多创新。因此可以说，招商局的整个历史都贯穿着民族复兴、民族振兴的理念或者精神。在目前中国加入 WTO、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作为一家大型国有企业，会面临国际上的竞争，我们不单是作为一家企业参与竞争，也代表着民族产业来参与竞争。还有一个内涵就是创新，我们要与时俱进，才能有开放性、包容性。无论是初创时的制度建设、治理结构的设计，还是第二次辉煌的时候，袁庚同志在蛇口倡导的一些理念和制度创新，都是我们企业文化中的宝贵内涵。我们今天做这些事，推动招商局史研究，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发掘招商局的宝贵历史财富，为企业文化建设增添更多的养料。

二 倡导求真务实的学风， 力戒急功近利思想

现在研究历史，特别是研究企业史，不是那么时髦，大多数人都都不甘愿去做这些事。我很钦佩在座的专家、教授、学者们能这么热心。时下的学风，是非常功利的。但是总需要有人坐下来去研究一些问题，功利的思想或者说是急功近利的思想是学风或研究工作的一个大忌。实际上，推而广之，搞经营工作、搞政治工作都不能急功近利。现在很多人热衷于追求单纯的 GDP 增长、“政绩”、“形象工程”等，这反映出从学风到文风到社会风气，急功近利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能不能坐得下来干实事、求真务实十分重要。国家领导人都强调要求求真务实，毛主席就曾为此写

过《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等名篇，邓小平也曾多次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思想。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引起大家高度关注的问题。

三 倡导实证研究，避免 简单地套用理论模型

在研究方法上，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引起大家思考。现在很多研究偏重于理论模型或数学模型，而不重实证。这是经济学中主流学派的特征或导向。如果大家注意的话，可以看到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两位实证研究学者（他们是研究经济周期的，也建立了模型）。这两个人是根据十年以上的多个国家的统计资料，来研究真实经济周期的规律。我想由此讲一讲我研究经济学方面的一些体会。最早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研究财富的创造和分配的，面比较宽。以后马克思把这个领域扩展到了制度，引入一些非经济方面的因素来研究经济现象。到后来就越来越回归到一个纯经济学问题。从马歇尔开始，新古典主义出来后，越来越采用边际方法和均衡理论把经济问题模型化。模型做得越来越完美了，以至于没什么好做了。但在完美的同时，也越来越脱离实际，距离现实越来越远。最近十几年，制度经济学发展得快，但多进不了经济学的主流，因为不是用模型做出来的。在历史研究领域也有类似情况。当年黄仁宇先生写的《万历十五年》，在美国、英国都出版不了，因为他是用一种不同的方法来研究，不是主流派。这导致了现在所谓的“经济学危机”，即：一方面模型做得很完美，没什么好做了；另一方面这些模型又脱离现实很远。所以现在人们又开始提倡能不能做点实证研究，能不能从现实中去挖掘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包括数理统计、案例研究、社会调查。这是经济学本身碰到的一个重大问题。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

给了这样两个人是很有意义的。我们所做的历史研究更是一种实证研究，几万卷的资料，还有大量前人的研究成果和一些围绕着研究主题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背景，都需要进行实证研究。

我最近看了两本书，一本是葛兆光写的《中国思想史》（共三册：导论：《思想史的写法》、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第二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葛兆光是一位我很钦佩的中年历史学家，他提出，我们看到的思想史往往被写成思想家的史，就是把一个个思想家的思想列出来，而这些思想家的思想就被简单地认为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主流文化或者是显学。实际上，不一定是这么回事，因为有的思想家可能很超前或者是专注于一个比较窄的领域，这些问题并不一定是当时那个时代大多数人关心的问题。后人为简便起见，就把它们不加分析地一编，所以大家一看，就以为那就是那个时代的主流思想了，影响那代人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就是这些思想家的思想。这就是被剪裁过的历史，这就是缺乏实证。结果从考古中，从很多实证的考证中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因而不要把思想史变成思想家的史，这个观点很具有启发性。还有一本书叫《战天京》，是写晚清时期的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等几个人物。曾国藩这个人是很有代表性的，曾国藩的家书、奏折都保留得很好，在长沙博物馆里保存着。作者居然能从那么多资料中找出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他想说明什么问题呢？具体没有说，我自己体会是想说明曾国藩被描绘成一个理学家、大儒，一个道德的典范，但是在官场上他也不能洁身自好，不得不用很多卑鄙的手段和皇帝、政敌周旋，这也是一种实证研究。因此，我觉得实证研究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需要大量的资料，需要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急功近利、投机取巧、哗众取宠或追随时尚，都不是我们要倡导的学风。

历史的演变是由各种因素促成的，我们在研究中还有一个大

忌，就是希望用一种模式来解释历史，用一个理论、一个框架写历史，我觉得这样容易简单化。回到刚才讲的经济学问题，经济学不仅是因为它脱离实际遇到了危机和挑战，经济学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主流学派的理论、观点方法被简单地套用。现在所谓的主流经济学，是在欧美的历史文化环境中诞生的。它对经济现象有理性的思考，但它并不是亚洲，特别不是中国环境条件下诞生的。我们现在习惯于碰到问题先说西方的情况下怎么解释。比如，说政府追求 GDP，那不对，政府应该搞公共财政，不应该追求 GDP；说我们粗放生产，那不行，竞争性是由劳动生产率决定的，不是靠大量资源的投入。中国为什么会出现政府追求 GDP 呢？为什么会有粗放型的生产方式呢？这两个痼疾为什么挥之不去呢？这不是现在提出来的，20 世纪 90 年代党中央就提出两个转变了，他就不去研究，他从西方那里搬来理论一对应就完了。中央政府几次调整，还是非常庞大，是相当集权的，还有 30 个省级政府，底下有两千多个县，还有乡，谁去研究它们？至今我没见到几篇实证的、认真的或者说有深度的研究中国政府行为的文章。我们应该看到，这虽然是在西方经济学中已解决的问题，是不需要讨论的问题，但在中国则是需要深入挖掘、解决的重要问题。我认为研究历史也应该和研究经济学一样，避免用一种简单的模式，特别要避免用西方的简单的模式来探讨。

对招商局的历史，我自己的评价是刚刚扫了一点盲，我在这方面的知识、能力很有限，因此这里我只能在方法论上谈谈体会，供大家参考。

谢谢大家。

2004 年 12 月 9 日

蛇口

易惠莉

《招商局与近代中国研究》 论文集编选说明

——兼评招商局史的研究

2004年12月，以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博士为会长的招商局史研究会在深圳成立，研究会聘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荫贵，澳洲昆士兰大学历史系教授黎志刚，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虞和平，原《中国水运报》、《中国水运》杂志社总编、编审张后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易惠莉等五人为特邀顾问兼特约研究员。今年3月，研究会决定出版此五位特邀顾问兼特约研究员研究招商局史的论文集。这就是《招商局与近代中国研究》论文集的最初计划。然而，这本论文集最终不仅编选了五位特邀顾问兼特约研究员关于招商局研究的论文，还选编了自有关于招商局史的学术研究展开以来各个历史时段有代表性的围绕招商局史研究的论文。^①这样，《招商局与近代中国研究》的内容就变得更加全面和丰富，使读者能够了解招商局史研究的概貌。

^① 虞和平先生因时间紧迫，未整理他有关招商局史研究的论文。故此集抱憾没收虞先生的论文。其他四位特邀顾问兼特约研究员的论文均由其本人提供。另外，朱荫贵推荐了陈振汉、陈潮、胡滨、李时岳先生的论文；黎志刚推荐了汪熙、刘广京先生的论文；易惠莉推荐了夏东元、陈绛、徐元基、张国辉先生的论文。最后，全部论文均由编委会定夺。

论文集中研究时间最早的一篇《“官督商办”制度与轮船招商局的经营（1872—1903）》，是1948年北京大学教授陈振汉先生为纪念北京大学50周年校庆而作，甫经完稿，却尘封半个世纪，终于1999年以原貌发表。^①编选此文的原因，除它是目前我们能够阅读到的最早对招商局史进行学术研究的论文外，还有下述三方面意义。一，该文的学术史回顾为我们了解关于招商局史在1949年前的研究状况提供了线索。如它指出民国二十四年有汤象龙的论文《轮船招商局的创立》发表，民国二十五年有陈隽如的论文《李鸿章与轮船招商局》发表。二，该文就交通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出版于民国二十年的《交通史·航政编》关于招商局的资料作了学术评述，为我们在利用该资料进行研究时提供了经验。论文谓：

是编所收史料不少，然既未鉴别真伪，亦未加以剪裁，仅将各方送报卷档及各项已刊记载，杂糅一处，略加类次而已，故舛误之处甚多，往往同一事实前后记载两异，同一地区在同一页中即名称迥殊。是以篇幅虽巨，记载多未可尽信。

三，该文在研究层面外，为我们了解民初以来有关招商局史的有影响的言论提供了线索。如论文提到：

作者所已寓目关涉招商局的言论记载中，除出于该局当事人及其友好后裔者之外，似乎都只有贬辞，绝少有赞扬它的业务成绩的。但举最易见到的为例，如刘锦藻在《清朝续文献通考》中对招商局早期业务的按语：“招商局岁有江浙漕粮之贴

^① 据陈振汉先生解释，论文“原拟编入《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因北平解放，该集未出版”。

运，又有回空之免税；太古、怡和无之，能雄飞于我江海各口，该局反蔑闻焉。光绪七年遣美富轮船过新加坡、小吕宋、檀香山一行，和平轮船之美国……终以折阅，从此无片轮出远海矣。……设当时不为苦蔽，整顿一新，至于今日所置码头栈房地亩，时价均以数十倍计，实力扩张，将驾太古、怡和而上之；乃视为利藪，群思攘夺，徒成一供差局所；门前冠盖如市，而有股份之商人，望之而逡巡不敢进。”^①……此外如民国十六年国民政府成立，交通部派员改组招商局，重行“官督商办”之制，由部长王伯群兼任监督。王氏在就职的时候所发表告股东书，大概很足以代表当时一般人对于该局的观感的：“招商局以千余万之资金，积数十年之历史，遇特别之机会（如前清运漕及欧战船运大涨等），享天然之优惠（如码头以地产涨价），而大之不能为国家张航权，小之不能为股东保利益，以视邻邦之邮船会社等成立转迟，规模较小，而彼日光大，我日衰落。……且营业日益缩，财产日益绌，债务日益重，岌岌乎有落日孤城，不能自支之势。”^②

另外，如果再将该文与 20 世纪 80 年代海峡两岸学者在招商局史研究领域的相关论著作比较，必须承认它在后来被本研究领域关注的诸多问题上，都已有相当深度的涉入，如招商局创办的社会政治背景、收购旗昌轮船公司资产的活动、股本官利、私人轮船附局经营、齐价合同及垄断、资金外流等等问题。而且，论文作者作为经济史学者在中西方史学领域及现实经济问题上的广泛涉历，令论文对招商局的研究具备独特视角，使半个多世纪前

①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邮传二，第 361 卷，考第 11044 页。

② 刘锦藻属前清士大夫，民国交通部长王伯群则代表另一类有社会影响的群体。除此而外，作者还列举西方人笔下两例与国人相似的关于招商局历史的观感。

的旧作在当今研究者读来不但毫无陈旧之感，而且启发颇多。不过，论文作者在1999年发表此文时的自我评价，却似乎不高，有所谓此文“由于问题的性质和受史料的限制，也有点近乎史论”的说法。^① 史学研究本应是从“史事”到“史论”的归纳抽象的“论证”关系，作者对论文“近乎史论”的评说，实际上是反省和否定论文撰作中结论先行的研究方法。在1948年的各种条件下撰作此文，“受史料的限制”是当然的。但作者将之视为造成论文“史论”倾向过重原因之一，还应该与论文中所谓“招商局史料中纯粹关乎主持者私人的贪劣痕迹，也多被淹没洗涤，而制度组织得失的渊源还很显然，所以本文先以这方面的讨论为限”的说法相联系。^② 即作者认为当年所具有的史料性质，制约了他从具体的人事方面探究招商局经营活动的可能。^③ 而作者所谓“问题的性质”，则似当从作者从事该项研究所持问题意识作理解。陈振汉先生作为在美国接受过系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学训练的学者，很自然对抗战结束后中国出现的官僚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产生疑问^④，因而作者关于现行政治与经济关系的思考，难免投射到《“官督商办”制度与轮船

① 陈振汉：《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自序》，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 《“官督商办”制度与轮船招商局的经营（1872—1903）》，《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第445页。

③ 正因此，论文不但架空关于人物的评价，而且架空关于“官办”、“商办”的评价，否定1873—1883年唐廷枢、徐润主持局务期间和1884—1903年盛宣怀督办期间的差异性，而力求强调制度建设问题。

④ 陈振汉先生于二战期间自美国留学归国，对政府的现行经济政策和制度极为关注，发表论文：《战时经济的统制与放任》（1941年）、《经济政策在苏德经济建设中之地位——经济建设与经济政策问题之一》（1943年）、《中国政治传统与经济建设政策——经济建设与经济政策问题之二》（1943年）、《中国战后经济建设与计划经济》（1943年）、《从政治进步中求经济安定》（1947年）、《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1947年）、《工业化、资本蓄积与财富分配》（1947年）等（据《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仅从论文标题就可知作者的关注所在。

招商局的经营（1872—1903）》的论文中。更可能撰作此文的原因，是作者为借助历史经验清理对现行政治与经济关系思考的线索，并提供立论的依据。论文结论部分所表现的强烈的问题意识——与资本性质相吻合的企业管理制度以及约束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制度，不但是企业经营成败的关键，也是发挥企业社会公共效益的关键——事实上正是作者的现实关怀。这样的问题意识决定论文的“史论”倾向，其立足制度而放弃在人事上追究招商局经营失败原因的研究路径也决定于此。由此，论文立论的整体框架也留下作者本人不能不正视的缺憾。因为尽管论文以《“官督商办”制度与轮船招商局的经营（1872—1903）》为题，但作者从一开始就否定“官督商办”对招商局经营活动的制度价值，称其“没有具体条例”，尤其在官方对企业的权利和义务方面，“从来不曾有过明白的说明，完全随着该局的业务发展与实际需要而有不同的甚至自相矛盾的解释”。既然“官督商办”只是一种缺乏明确内容的空洞无据的制度标签，招商局作为近代最早的企业，其制度建设的开创性作用就被否定。作者的研究“从‘资金来源’与‘用人权责’两方面来证明该局的官督官办性质”^①。而招商局所标榜的“官督商办”既不构成对其经营活动的制度支持，又不构成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制度约束，只有官员个人和商人从其不成功的经营中获利，作为投资主体的政府以及由政府代表的社会公众利益，则未能获得应有的利益。^②

尽管《“官督商办”制度与轮船招商局的经营（1872—

① 《“官督商办”制度与轮船招商局的经营（1872—1903）》，《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第515页。

② 作者就招商局成立时李鸿章代表招商局对政府的承诺，收购旗昌船队时唐廷枢代表招商局对政府的承诺，指称招商局作为一个“官办”企业负有政府，即有负国家及社会公众利益。而论文并没有就此沿着一个有价值的方向展开，即批判招商局经营管理者——无论官方或商人方面，均缺乏制度建设的自觉意识。

1903)》由于种种原因 1949 年后并未发表,但主要从政治上、制度上检讨招商局的成败却似乎是中国大陆史学研究者普遍的研究方法。中国大陆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事演变线索的理解,是根据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论断:“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由此形成的中国近代历史“两个过程”的阐释模式,除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进化史观,以及人类社会必然经历五种社会形态的普遍法则的意识形态影响外,更重要的还来自由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现实所决定的意识形态需要。即最初由政治上彻底否定前统治中国的国民党政权的需要,逐渐演化为为自力更生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环境的需要。对于 1840 年前中国历史的理解——认为中国自身完全具备由当时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演变的资源,而 1840 年以来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阻断了中国社会自主进步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认识指导下,关于明清时期(1840 年前)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就长期成为中国大陆史学界研究的重大课题。“文革”前及“文革”中对近代西方列强在华的军事侵略活动,以及经济的、文化的活动的批判,就是以这些活动阻断中国在 1840 年前就存在的自主发展历史进程的认识为基础的,并将这种认识上升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理论。

在中国近代史“两个过程”的阐释模式下,洋务运动被定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中——两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而“两个过程”的阐释模式及

关于洋务运动的评价，在 1946 年出版的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和 1948 年出版的胡绳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已为定论。但 50 年代后我国史学界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在具体从事洋务运动中企业活动性质的研究时，还是在如何评价以招商局为代表的“官督商办”企业活动的民族资本主义因素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争论的分歧点具体落实在资本的性质、产品的性质、经营管理方式的性质等经济学理论的基本要素上，并在其中贯彻以彻底的阶级分析法，追究人、资本、企业的阶级属性。以此为背景的招商局史研究，就带上更强的“史论”化倾向。关于资本的属性，在 1948 年的《“官督商办”制度与轮船招商局的经营（1872—1903）》中，仅有不附加价值评判的“官”（公）—“商”（私）区分，但此期则被细化为附加价值评判的“官僚”（半封建的象征）—“买办”（半殖民地化的象征）—“商人”（资本主义的象征）的区分。除此之外，“史论”化倾向还表现在对“史事”论证所引用资料的丰富性、科学性下降，对有重要影响的事件和人物进行细致具体研究的论文和专著的缺席，一般论文和专著对论题的历史时段界定问题的忽略，引证具体“史事”的时间概念不被重视等等。60 年代前半期，大陆史学界关于洋务运动中企业活动性质的争论的意义在于，它表明在以进化论为理论框架的中国近代史“两个过程”的阐释模式中，关于洋务运动的定位成为其理论上的薄弱环节。这是该阐释模式最终解体的关键所在。

当大陆研究者就洋务运动中企业活动的性质发生分歧争论之初，美国学者费维恺于 1958 年发表了题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的专著，其中对招商局经营活动的探讨占相当大的篇幅。该著不但将招商局的经营置于以盛宣怀为中心的具体人事背景下，而且置于晚清复杂的政治背景下进行考察。作者认为“清末 40 年中的中国工